

抉擇、自由、創造

——試論蘇東坡筆下的陶淵明

方 瑜^{*}

提 要

陶淵明在文學史上地位的確立，宋代重要級文人的稱許是重要關鍵，其中，蘇東坡對淵明其人其詩的讚譽更舉足輕重，不斷被後人引述。但陶蘇二人，不僅時代遙隔，平生遭際也並不相類，性格相近處似乎也不多。東坡為何如此推重淵明？甚至陸續「和陶詩」一百零九篇？這是本文試圖加以探究的出發點。

全篇從抉擇的觀點切入，認為淵明對出處進退的抉擇其實涉及個性的深層，以黑格爾人類精神發展史「氣魄人」的論點，與朱熹對淵明的認知印證。而淵明能超越「他人價值取向」以獲致精神自由的真正實踐，是東坡最為折服之處。再從「飄流與創造」的觀點，分析從權力中心脫逸而出的傳統知識份子，如何藉創作，保持心靈的覺醒，並樹立人格典型。而從陶、蘇作品中對大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自然與生死的體認，可以尋索二人精神上的遙相契合。

最後再借用哈羅德·布羅姆「影響的焦慮」觀點，認為東坡可能自覺或不自覺的視淵明為「競爭對手」，而東坡最終在文學史上的成就也可能多少與此「焦慮的超克」有關。

關鍵字：抉擇 自由 蘇東坡 陶淵明

Choice, Freedom and Creativity

—— Tao Yuan-ming As Depicted by Su Dong-po

Fang Yu

Abstract

The high appraisal of Tao Yuan-ming by important men of letters in the Sung Dynasty plays a key role in establishing him as a major writer. Su Dong-po, among them, extols both the poetry and personality of Tao, and Su's praises are determining and quoted very often in later ages. However, Tao and Su live in ages far apart, their fate and experience diverse, and their personality 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Why does Su think so highly of Tao? Why does Su write over the years 109 poems to rhyme with Tao's poems? These questions are the doors that lead to the core that my essay tries to explore.

My essay will start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 of choice: Tao's choices of taking a civil post and later resigning to be a recluse are in fact related to the innermost parts of his personality; my points

are based on the idea of the thymos man in Hegel's concept of human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an be evidenced by Zhu Xi's views on Tao. What Su admires most in Tao is his ability to transcend the value systems of others and to truly obtain spiritual freedom. Then, I will employ the concept about drift and creativity to analyze how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who have drifted away from the center of power can establish themselves as models of integrity by means of maintaining spiritual awareness. The compatibility of Su and Tao as soul mates can be proven by how in their writing they perceive nature as well as life and death in similar ways.

Finally, I will adopt Harold Bloom's concept concerning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to show that Su might,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take Tao as his rival; that Su tries hard to overcome this anxiety migh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his eventual great achievements in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Choice, freedom, Su dong-po, Tao Yuan-ming

抉擇、自由、創造

——試論蘇東坡的陶淵明

方 瑜

與陶淵明時代相近的兩部重要文學批評著述——《文心雕龍》和《詩品》，其中《文心雕龍》（才略篇）對「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劉、郭」等詩人，都標舉姓名，加以品題，卻獨不及淵明。而《詩品》則只列淵明於中品，卻極重謝靈運，不僅列居上品，且推崇備至、稱美有加。^①顏延之為淵明舊友，為其作誄，僅稱其「孤生介立之節」，對淵明詩文只云「文取指達」而已。即使當時極力推重淵明的蕭氏兄弟——梁昭明太子及簡文帝，雖稱譽淵明「文章不群，辭采精拔，抑揚爽朗，莫之與京。」^②但「顧二人詩文，都沿時體，無絲毫胎息淵明。」^③因此，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旁徵博引、舉証歷歷之後，認為「記室（鍾嶸）評詩，貴氣盛詞麗。所謂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故最尊陳思、士衡、謝客三人……宜與淵明之和平淡遠，不相水乳。所取

① 鍾嶸《詩品》卷上稱大謝「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

② 見蕭統「陶淵明集序」，《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詩文彙評》頁9。

③ 錢鍾書《談藝錄》頁91。

反在其華靡之句，仍囿於時習耳。」^④至於唐代詩人，對淵明或美其志節，或愛其好酒，縱使「學陶」也多空泛語，難以神似。「可見淵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爲貴。」^⑤王叔岷師在〈論鍾嶸評陶淵明〉一文中，亦云：「陶詩應列上品，固無疑義，惟齊梁時代之文學界及文學批評界，偏重辭彩之美，陶詩之特點，乃意境之美。辭彩之美，易受賞識；意境之美，難於領會。與鍾氏同時之劉勰，所著《文心雕龍》，爲文學批評之寶典，其明詩篇自詩之定義、起源，評述至劉宋時代之詩，標舉歷代之代表作家，曾無一語涉及陶公，此誠一大疏漏。反觀鍾氏詩品，能列陶詩於中品，就齊梁時代而言，已具特識矣。」^⑥可見淵明在齊梁甚至唐代都尚未受到普遍的推重與肯定。陶淵明在文學史上地位的提升與確立，宋代是重要的轉變關鍵。《談藝錄》中云「淵明文名，至宋而極。永叔推歸去來辭爲晉文獨一；東坡和陶，稱爲曹劉鮑謝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後，說詩者幾於萬口同聲，翕然無間。」^⑦宋初重量級文人對淵明的推許，蘇軾自是舉足輕重的代表，東坡對淵明其人其詩稱譽之辭，不但爲後人重複引述，而且成爲論述淵明不容忽視的重要依据。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從此「萬口同聲」殆無疑義。

但細究淵明與東坡，不僅時代遙隔，平生遭際也並不相類，性格相近處似乎也不多。宋史蘇軾傳稱許其「器識、議論、文章、政事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⑧而淵明除了志節、文章之外，從傳記資料中似乎很難見出器識、議論、政事三方面的卓傑表現。然則，東坡在才學深爲時人推重，負「特立邁往之志氣」，且亦以此自許

④ 同上，頁 93。

⑤ 同註 2。

⑥ 收入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528。

⑦ 同註 3，頁 88。

⑧ 見《宋史》本傳。

的情況下，對歷代著名詩人文士均罕見許可，為何如此毫無保留的傾倒於淵明？甚至陸續和陶詩一百零九篇？東坡究竟察覺了淵明個性、生命中何種特質以致於如此被淵明吸引？東坡心目中的陶淵明是何等人物？淵明與東坡真正遙相契合之處為何？後文試圖從幾個比較不同於前人的觀點加以探究。

一、氣魄與自由——淵明的抉擇

（1）東坡對淵明的認知

東坡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後云「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⑨似乎將淵明詩篇當作治療病恙的葯石；又像孩童面對心愛餅餌，雖然垂涎不已，卻往往不捨大口嚼食，寧願細細啃嚙，儘量延長享受品味的時間。淵明詩對東坡的吸引力，僅此數句已鮮明如見。

東坡晚年謫居儋耳（海南），與弟蘇轍書，信中對淵明人格與詩篇的評論，最為完整，現先就其中對淵明其人之稱譽論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⑩東坡自認為在「性剛才拙，與物多忤」的性格方面，與淵明相近，卻不能如淵明之「早自知」而歸隱田園，以致「半生出仕，以犯世患」，因此深愧淵明，欲以晚節餘生，師範效法，以補前過。

東坡平生從政之途，誠然「與物多忤」，但是否真正自認「才拙」，卻值

^⑨ 同註2，頁28。

^⑩ 見東坡和陶詩前子由所作之引文，收入《蘇東坡全集》續集卷三，頁70。

得深究。蘇轍在收到這封信後也說：「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於淵明，其誰肯信之？」但子由畢竟是東坡的深情手足，他接著說：「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區區之跡，蓋未足以論士也。」^⑪東坡這段「自白」之言，涉及的正是士人自古及今始終必須嚴肅面對的「出處進退」，也就是「抉擇取捨」。所謂抉擇就是：有所取，也有所捨；有所得，也有所失。既然不能全有，就不能不做輕重大小利害的判斷，這與個性和價值觀都有深密關連。叔岷師曾引陶詩爲証論淵明的個性「陶公人德之高，人咸知之。余尤愛陶公之高而能謙也……行賢而去自賢之心，此陶公之所以不可及者也。」^⑫特別提出淵明「自謙」與「去賢」的特質。而鄭因百師論東坡則說「天資既高，豪邁之氣不能自掩，每以文字談諧開罪於人，屢遭遷謫，非盡由於政爭也。」^⑬可見才氣難以自掩、「一肚皮不合時宜」的蘇東坡，與「自謙」似乎很難相合。

証諸東坡另一條對淵明的評語，更可見東坡個性，在鈔錄淵明「飲酒」「清晨聞叩門」全詩之後，東坡針對詩中淵明與田夫的應答，評述說：「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予，以謂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⑭表面看來，東坡認同淵明的實話實說，「發於心，衝於口」。寧願「逆人」，不願「逆己」。其實，淵明此詩，敘事而兼問答，田夫勸其出仕「檻樓茅簷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而淵明則堅持歸隱的選擇「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⑪ 同上。

⑫ 同註6，頁537。

⑬ 見鄭騫《詞選》蘇軾詞選前之簡傳。頁48。

⑭ 同註2，頁31。

從這個觀點，再看幾條東坡對淵明的稱賞，也都與抉擇有關。書淵明「種豆南山下」詩後「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⑮東坡對淵明詩的評述及和其詩作，並非成於一時，雖然多為晚年謫居惠州、瓊州之作，但也有早在揚州即和其「飲酒」二十首^⑯。這條「歸園田居」「種豆」詩評述難得注明了年月，元祐九年（即紹聖元年 1094），東坡五十八歲，知定州。「夕露沾衣」的「見習」農夫，與「安享公田數頃」的彭澤縣令，當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生選擇。

題淵明「秋菊有佳色」詩，評曰：「靖節以無事自適為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⑰役於物，即為外物所役，與無事自適，自為主体，也是不同的人生抉擇。東坡就淵明此詩末聯「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的一肯定語，特意從反面設問說：那麼，「凡役於物者」，豈非也就是喪失了自己真實的生命？

東坡書淵明「乞食詩」後，對淵明隱居務農，在田穫青黃不接的時節，竟然會餓得「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以致向人叩門求食，得食之後，感激到竟欲來生結草啣環以報，不禁深有所慨。「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哀哉！非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⑱東坡一己為淵明哀之不足，更言「舉世莫不哀」，但所謂「身前飢寒」與「身後高名」之不相待，與杜甫稱李白「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其意相類，這樣的遭遇也許不能完全由人自擇，畢竟仍與個性有關，雖然東坡對淵明乞食，滿懷哀矜之餘，並未強

⑮ 同上。

⑯ 同註 10，頁 77，和詩前東坡自云「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飲酒二十首。」東坡在揚州之確實年代待考，如為任官徐州之時，則為元豐元年至二年，東坡四十三、四歲。

⑰ 同註 2，頁 29。

⑱ 同註 14。

調這點。參照唐代詩人王維同樣對淵明「乞食詩」的評語，更可見摩詰與淵明、東坡認知的差異。

王維「與魏居士書」中云「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慚也。嘗見督郵，安享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免其後之累也。」^{①⑨}雖然這封信是爲了勸友人出仕而寫，當初的原始意圖已向仕途傾斜，不免特別強調隱居之困窘，但王維很明顯的與東坡不同，他將淵明之所以「乞食」置於「抉擇」的層面。認爲淵明本可以忍一時之慚——把板屈腰見督郵；卻寧願捨印綬棄官而去，結果落到終身慚——屢乞而慚。因此，王維認爲淵明在「人我攻中」的內在掙扎之後，做了「忘大守小」的錯誤抉擇，以致「不免其後之累」。所謂大、小、輕、重，當然是一種抉擇，除非在價值觀的認知方面，有相同的標準，每個人的考量，差異一定很大。正如史遷所云「舉世皆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伯夷列傳）難怪錢鍾書先生認爲王維田園之作「太風流華貴，似失之過綺」，是「以勞農力田爲逸農行田。」「并不取淵明之爲人矣。」^{②⑩}王維雖有「田園詩人」之稱，卻並非淵明的傾慕者，更非異代同情之知己。

淵明真正的知己，仍須等待東坡。然則，在時代、遭遇、性格諸多差異之外，東坡所以對淵明付出如許之肯定、稱許、同情，其深層原因究竟何在？也許應該從「抉擇」的觀點，再加深究，而抉擇不免與「自由」密切相關。

因此，在下一小節中，試圖借用西方哲學家對人的精神層面的析論，探索影響人做抉擇的一些根源因素。雖然歷史、文化背景不盡相同，但對人性的分析探究，「他山之石」應仍有可供參攷、啓發之處。

^{①⑨} 同上，頁 16。

^{②⑩} 同註 3，頁 90。

（ 2 ） 氣魄與取捨抉擇

柏拉圖在他的鉅著《共和國》中，首先將人的精神析分為三部分：欲望（ desire ）、理性（ reason ）和氣魄（ thymos ）。人的行為一般均為前兩部分的組合，欲望，讓人追求自己缺乏的事物，理性則告知人們獲取它們的最佳方法。

自柏拉圖之後，西方哲學家往往均從這種觀點加以演繹。例如英國的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 – 1679 ）所強調的「意志」，即界說為「深思熟慮後之最後欲求。」而其後之洛克（ John Locke 1632 – 1704 ）則強調「欲望」，但卻將欲望定義為「開明的私利」，亦即欲望應與理性結合，人可以滿足自己的欲望到某種程度。^①然而，其後以唯心的精神哲學著稱的黑格爾（ 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 – 1831 ）卻特別突顯第三部分——氣魄的重要。^②他認為除了欲望與理性之外，人都希望他人承認自己的價值，肯定自己的尊嚴（ Selfesteem ）。真正可以滿足人的，不是物質豐裕，而是自己的地位、尊嚴獲得承認。被人認為沒價值就會生氣，不能依憑自己的價值生活就覺羞恥，以符合自己價值觀的方式看待自己就覺驕傲。黑格爾認為正是這類感情推動整個歷史過程。

他提出迥異於前人的觀點，主張推進人類歷史發展的原動力，不是近代自然科學，也不是無限膨脹的欲望體系，而是希望獲得他人承認的努力。歷史上

① 此處關於霍布斯、洛克的引述，見法蘭西斯·福山著、李永熾譯《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第十三章「道德自由的島嶼」論霍布斯、洛克與黑格爾，頁 182 – 190。

② 有關黑格爾思想的詮釋，歷來論家不盡相同，爭議甚多，如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國家的神話》第十七章「黑格爾」對此即有概述。本章所引之觀點乃福山根據二十世紀研究黑格爾之權威學者柯傑夫（ Alexandre Kojève ）之說所作之申論，見《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序論及第三部「要求承認的鬥爭過程」頁 179 – 268。

的宗教戰爭、民族主義鬥爭，以致晚近的民主，基本上都是根源於「認知鬥爭」的不同表現。

黑格爾突顯人類精神層面源於氣魄的「認知」之爭，他說，在原始時代的血腥之戰中，看見人類自由的曙光，「只有敢以生命為賭注，自由才能獲致。」^{②③}這是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巨大分野。為了自由，敢以生命為賭注，這已違反了生物自我保存的本能，而人之所以為人，正內含有征服、否定動物本質的能力。此外，「只有人才會追求獎牌、敵旗等從生物學看來完全無用之物。」^{②④}人所以會追求這些「無用之物」，不在其本身價值，而是因為他人也同樣追求。因此，黑格爾認為人類基本上是「他人取向型」的。也就是以眾人認定的價值標準為努力目標。

從人類歷史進程而言，原始人自我保存的動物性本能最強；到了早期階級社會，貴族與奴隸之差異，黑格爾認為並非基於地主、佃農等經濟功能，而是在於對死亡的態度。敢以生命為賭注而冒險的主人與不敢冒生命危險的奴僕之間，社會開始分化了階級。^{②⑤}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也有「欲望人、經濟人」和「氣魄人、憤怒人」的差異。前者仍是以自我保存為重，內心最重損益計算，追求物質幸福，滿足私欲、私利。在體制內扎根，關心周遭社會只視為滿足私利之手段，不論公共精神及他人之幸福。

從前文簡略綜述黑格爾對人類精神發展史的看法，似乎認為：人的自由，首先是敢以氣魄超越自己的動物性本能，不單為私欲、私利、損益計算。但能夠超越這種動物本能的「氣魄人、憤怒人」卻仍不免於「他人價值取向」，也就是特別看重尊嚴及他人的認知、肯定。不過，黑格爾強調「氣魄」同樣具有光明面與黑暗面，正面的氣魄是勇氣、利他主義、對弱者的關心、正義等的心

②③ 同上，序論，頁 8-9。

②④ 同註 21 頁 189，及第十四章頁 194-203 均涉及對此種觀念之詮釋。

②⑤ 同上。

理基礎；但負面的氣魄則是專制政治、帝國主義、支配欲望的根源。^{②⑥}

如果以這種觀點推衍，真正的自由，除了超越動物性本能之外，還必須能克服「他人價值取向」，才算澈底。但這似乎正是看重自我認知、尊嚴的「氣魄人」必須面對、卻難以超克的難局。

中國古代典籍中，也有可以與此印証的記載，例如《史記》（伯夷列傳）引賈誼（鵬鳥賦）「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其中貪財、貪生似乎應屬「欲望人、經濟人」之類；而殉名、死權則近乎「氣魄人、憤怒人」。而《莊子》（養生主篇）提出：養生如不能形、神兼顧，則寧可形殘而神全。形殘是自然的決定，神全則超越了動物性自然的本能，而與人類精神層面的提昇息息相關。（秋水篇）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自貴而相賤，應與自尊、自我肯定相關；而貴賤不在己則與他人價值取向相近。至於（逍遙遊）中所述：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至人無己。則更是在超越他人價值取向方面臻及高遠超邁之境。

朱熹論淵明之歸隱，曾提出相當有創意的觀點，認為「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陶欲有爲不能者也，又好名。」^{②⑦}如果認同朱子這種看法，則淵明無疑正是「氣魄人、憤怒人」。清龔自珍論陶之詩云「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雪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②⑧}特別強調淵明之豪氣，並與屈子、武侯並論，顯然與朱子同意。

而朱光潛先生則認為淵明個性中有隱、有俠，以及極實際、平常的三種特質。「他的時運詩序中最後一句話是欣慨交心，這句話可以總結他的精神生活。……他的性格大体上很冲淡平和，但也有他剛毅果敢的一面。……他的隱與俠都與這方面性格有關。……他有時很放浪不拘形跡，……但是他不恥事家

②⑥ 同上，參見第十六章「紅臉頰的野獸」頁218-230及第十七章「氣魄的興衰」頁232-245。

②⑦ 同註2，頁75。

②⑧ 同上，頁237。

人生產。……他高超的胸襟，並不損於他深廣的同情，他的隱與俠也無害於他平常人的面貌。」^{②9}可見淵明「氣魄人」的特質其實相當突出，只是比較內斂、不輕發而已。難怪梁啟超評淵明「飲酒」說「和屈原的卜居、漁父一樣心事，不過，屈原的骨骸顯在外面，他卻藏在裏頭罷了。」^{③0}

但東坡對淵明的認識，想來應該有所不同於朱子等人。從前文引述東坡對淵明之稱賞而論，淵明對田夫的回答：「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很明顯是超越「損益計算」的人生抉擇，但東坡則特別強調「言發於心，而衝於口」的一面，認為自己在「寧逆人，不逆己」的個性上，與淵明相合。可見東坡性格中「帶氣負性」的「氣魄人、憤怒人」特質，其實比淵明更為突出。而感慨「以夕露沾衣故，而犯所愧者多矣！」東坡讚嘆的乃是淵明「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能不顧現實損益利害，而以追求精神自由為重。稱淵明之無事自適是不役於物、得此生，其意正同。至於對「乞食」詩之嘆惜，更是憐惜淵明在損益利害之外，連現實的安全、溫飽都能置之度外，在毫無隱居條件的處境下，毅然背棄自我保存的本能，唯以「心不能為形所役」為考量基準。王維固然亦慕隱、歸田園，晚年生活簡淡如僧，但摩詰之所以不能知淵明，正在於他是在歸隱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隱居，只是不同生活方式的選擇；而淵明面對的卻是遠為深刻、艱難的生存難局之抉擇。這就不免涉及所謂「他人價值取向」的問題，其實也是價值觀、輕重大小的抉擇。

（ 3 ）他人價值取向之超越

東坡稱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古今賢之，貴其真也。」^{③1}已清楚指出淵明對他人毀譽並不介意，不以眾人認定的

^{②9} 同上，頁 373、370。

^{③0} 同上，頁 276。

^{③1} 同上，頁 33，「書李簡夫書集後」。

價值標準，作為一己行為之準則。真正的精神自由，以及由此而做的抉擇都根源於此。任何重要的抉擇，必定經過內心得失取舍的衡量、掙扎。王維說淵明「人我攻中」，正指出淵明「捨彭澤縣令」的決定，雖似偶然突發的衝動，^{③②}但必然經歷長期的思考、掙扎。而他責淵明之捨官就農、淪落乞食以致終身慚是「忘大守小」，也值得深論。所謂「慚」，仍與自我肯定、他人認知有關。如果無法肯定自己的行為，不能依憑自己的價值觀生活，會覺得羞慚。那麼，淵明決不應以「乞食」為慚，因為，這是他不願「心為形役」，寧取「身有餘勞，心有常閒」，自我抉擇做一個不熟練的農夫，必須承擔的後果。至於大、小、輕、重，各人評估的差異，更難相同。孰大孰小，孰輕孰重，並無定論。取捨之間，往往不免因時代、環境的制約而「從眾」，所謂「他人價值取向」，正是此意。能真正以精神之自由為重，完全超越他人價值取向，這才是淵明之「真」的精義，也是最難企及之處，更是東坡對淵明折服之根源。東坡並不能真正不介意他人之毀譽，不能斷然捨棄仕途，更難忍受「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一己與世人徹底之「相忘」。淵明做到了東坡認為自己也應該做卻始終未能實踐的抉擇，因此，才氣冠絕一世的蘇東坡才會在垂暮之年說出「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的心聲。

對於淵明的作品，東坡也稱譽有加，除了眾所周知「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③③}的激賞之外，東坡在「評韓柳詩」也提及淵明「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中邊者，百無一二也。」^{③④}這兩段話，互相參看，其義更

③② 見淵明「歸去來辭」自序云「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

③③ 同註 31，頁 35。

③④ 同上，頁 30。

顯。「質、枯、癯」是淵明詩之表象，與當時以華靡為尚的流行相違，不合他人價值取向的標準。而所謂「中」乃是實質、內涵，「膏美」與「綺、腴」均蘊含豐美、充盈、厚實之義。因此，東坡特別強調：能分別中、邊、內、外者，百無一二。也就是說：能真正不為外、邊之表象所限，真正認知淵明詩內蘊之豐美者，確實罕見。

東坡真正瞭解淵明，對其詩作能由「邊」見「中」，識其真美；在輕重大小價值觀的認知上，亦與淵明相契，卻不能在行為實踐的層面上仿慕追隨。雖仕途屢挫，移官頻仍、下獄謫放^⑤，卻始終未斷然棄官歸隱，淵明與東坡處身時代之差異，也是重要原因。晉末紛擾不寧的亂世，和北宋的一統王朝，在淵明、東坡脫逸權力中心的考量上，一定有相當不同的影響。後文即擬就離仕歸隱的飄流心態，探究隱者之自我創造，以及淵明與東坡在作品中呈現的精神契合。

二、飄流與創造——淵明與東坡之相契

（1）內在流亡與外在流亡

知識份子在仕、隱兩途進退徘徊，自古及今，未曾中止。以儒家觀點，出仕是正途，歸隱則是不得已之退路，或為遠禍全身，或因有志難伸，更有「清濁難以同流」，遂「寧隨黃鵠，不同雞鶩」，當然也有政爭失敗、被迫去職的隱退。原因不一，但與仕途相對的隱路，確實是「荒途橫古今」，雖非大道坦途，卻也始終「行人」不絕。

前近代專制社會，控制、編納的方法，遠不如今日科技社會體制的嚴密、

^⑤ 東坡屢遭遷謫及入獄事見「東坡先生年譜」《蘇東坡全集》。

精緻，個人反而比較容易從體制中心飄流、逸走。傳統知識份子從政治權力中心流亡，往往有恢復主体自由、尊嚴的自覺，不願屈從於當政者之意志。如果與二十世紀知識份子流亡避禍的遭遇比較而論，則當代知識份子的情況可分為兩類：

「一種是內在流亡，亦即國內流亡，這類流亡者為免牢獄之災，不敢直接向一元化的意識形態挑戰，只有採取沉默的抵抗，……不發言、不著述，讓內在熱情自我燃燒；另一種是外在流亡，亦即一般所說的流亡，也就是逃到外國，繼續抵抗，或表示異議。」^{③⑥}

如果借用這兩種區隔來討論前近代專制政權下知識份子的處境，則似乎應略加變易，所謂「內在流亡」乃是身體仍留在權力體制中，並未主動選擇飄流逸走，但內心抗爭的熱情未熄，並不能默而不言，往往發為詩文、議論，因而導致下獄或謫降。而「外在流亡」則可解釋為身心都從權力中心脫逸而出，飄流到鄉間、海隅、山邊、水澤，徹底改變身份，不再是官僚體制中的一份子。左思「詠史」第八首之「披褐出閭閻，高步追許由」庶幾近之。如果不是被迫去職，主動選擇這種徹底的「決裂」，對傳統知識份子而言，實在艱難。此所以左思「招隱詩」雖極力描摹隱居之樂園美景^{③⑦}，仍然「躊躇足力煩」，徘徊瞻顧，未能毅然歸隱。杜甫五古長篇「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在有意「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之後，不免又「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依戀京闕，終難隨白鷗之遠沒浩蕩蒼溟。可見做此抉擇之艱難。對一己處身的現實，尚未完全絕望的人，不太可能選擇徹底的流亡，這是一種起而行的實踐，採取行動之前，必然經過內在的掙扎。

^{③⑥} 見李永熾「流亡的苦楚與思想的開花」收入《世紀末的思想與社會》頁198。

^{③⑦} 左思「招隱詩」述隱居山中之情景為「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耀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可證。

「真確的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自己，想從黑暗中逃出，但逃不出去，可是必須逃出——這種掙扎的行為已向他保證黑暗的存在。」^{③⑧}淵明歷經多年徘徊、摸索，終於從自身無處著力、毫無變革希望的黑暗現實中逃亡出去。這種自我內在的長期鬥爭，決非容易，自勝為強，能夠獲勝的人，才堪稱真正的勇者。在徹底脫逸隱居的二十餘年間，淵明仍然經由不斷的自省、自思，幾度重新肯定自我的抉擇。^{③⑨}淵明晚年終能獲致「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的平靜和諧，正是因為這種不斷與內、外「黑暗」爭鬥的大勇。

然而東坡因為處身的時代不同，他在政治權力鬥爭中雖遭挫敗，卻並未對現實的黑暗絕望。對權力中心——朝廷，始終懷抱期待與忠誠，因此，東坡選擇內在流亡，讓熱情內燃，不斷發為詩文、議論，縱然付出被囚、謫放的代價，也不願真正脫逸飄流。然而，到了垂暮之年，從遠離權力中心的邊陲海隅——瓊州，回顧一生進退起伏的行跡，東坡難免有生命不能重來、時間已然流逝、現實終難變革的徒然之悲。因此，對淵明在人生中途毅然抉擇，衷心震動，遂有「吾真有此病，而早不自知，半生入仕，以犯世患」的慨嘆。

然而，事實上，無論哪一種「流亡」，多少都意謂承認敗北。「如果在精神上不能具有意識的深化，便不具任何意義。」^{④⑩}無力而又身居絕望、寂寞的處境，正是由內在蘊育抵抗精神的原動力，如能以個性、主體的創造，保持心靈的覺醒，並且留下業績，流亡才不是敗北，才具有意義。從這個觀點來看，淵明與東坡，都能在權力体制宰制之下，保持心靈的覺醒，不但創作了文學作品，也樹立了人格典型，他們雖是內在流亡或內、外流亡，卻都沒有敗北。

③⑧ 見李永熾「魯迅、日本、竹內好及其他」收入《世紀末的思想與社會》頁232。

③⑨ 淵明「歸去來辭并序」及「歸園田居」、「飲酒」諸詩均可為證。

④⑩ 同註36，頁199。

（2）人與自然的和諧……桃花源記、歸去來辭和赤壁賦

人與自然的關係，在歷史過程中曾有重大變化，在遠古的神話時代，人畏懼自然，臣服於自然之力，風雨雷電、山川星辰日月，均以之為神，敬拜崇奉，不敢有違。到了理性啓蒙時代，逐漸演變為人支配自然、藉自然之力為人服役，所謂戡天役物、利用厚生的思想，無論東西方皆然。晚近，科技進步，一日千里，卻促使人類開始反思這種人與自然的鬥爭，是否會造成不可反逆的破壞？結果導致「大地反撲」——自然界對人類過分行為的報復——兩敗俱傷？因此，開始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解」，人不臣屬於自然，也不支配自然，不主導，也不受制，不崇拜，也不傷害。以這種態度重新認知自然，也認知人，以臻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之境。^④

這種自然觀，其實早在淵明、東坡的作品中，已可尋得類似的聲音。淵明詩中時時流露與自然萬物相待如友的心境。例如「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停雲）「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時運）「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和郭主簿）「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飲酒）「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讀山海經）這些詩篇中，淵明都將自身視為大自然之一部份，與風、雲、魚、鳥、林木、雨水、新苗等同，置身其間，樂數晨夕，一如與友人相對。

朱光潛先生對此有極佳的詮說「他（淵明）把自己的胸襟氣韻貫注於外

^④ 這種觀念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工具》中已經提出，可參閱《國家的神話》第十八章「現代政治神話的技巧」頁377。

物，……同時也吸收外物的生命與情趣來擴大自己的胸襟氣韻。……所以無論是微雲孤鳥、時雨景風，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觸目成趣。」

「自然景物在淵明詩中向來不是一種點綴或陪襯，而是在情趣戲劇中扮演極生動的角色，稍露面目，便見出作者整個的人格。」^{④②}淵明不將自然景物視為點綴、陪襯，正可見出他精神境界之超邁，也是後世「學陶」的田園詩人難以神似之處。

梁啟超在「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中說「愛自然的結果，當然愛自由。淵明一生都是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奮鬥，鬥的什麼？鬥物質生活。」^{④③}因此，如果在精神生活方面能自主、自由，物質生活又能溫飽無憂，應該就是淵明的理想世界。在他的名作「桃花源記」和「歸去來辭」中都有清楚的闡述。

「桃花源詩并記」描述的樂園，雖然在某種層面上，也可視為淵明意圖從體制中脫逸、「內在流亡」的表徵。但文中呈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鮮明繪卷，真摯動人：「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沒有權力中心的宰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記曆誌，四時自成歲。」從「中心」飄流出去的人，建立了理想的夢土，自主、自由、自足，梁啟超稱之為「東方的烏托邦，極自由、極平等之愛的社會，美善相樂。」^{④④}這是淵明精神的「故鄉」，「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桃源中人正是他在塵世尋覓難遇的知己。

而在「歸去來辭并序」中，淵明更以堅守一己的抉擇並承擔抉擇的後果，親身體驗了與自然相處深刻而獨特的感受。「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

④② 同註 2，頁 369。

④③ 同上，頁 280。

④④ 同上，頁 279。

命復奚疑。」「歸去來辭」是淵明心靈與自己的對話，它適切的運用了個人自我的孤獨，「這份孤獨終歸是一個人與自身有限宿命的相遇。」^{④⑤}淵明將一己生命之修短與自然界萬物之榮枯變化，等量齊觀，領悟蒙莊齊死生的精義，終於臻至「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的「神釋」之境。

對此，東坡似乎也有相近的領悟。在他的名作「赤壁賦」中，蘇子與客展開對話，客所發之疑惑、感嘆，乃是眾人共有生年倏忽、時空無盡之悲。而蘇子的回答，則與淵明相類：「客亦知乎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東坡對明月、清風、山水的態度，不羨、不嫉，也不想據為己有。只想和諧的置身其間，視一己為自然中的一物，真誠的賞其聲色之美。這種身心均能自由、自適的時刻，正是東坡最嚮往的境界。

然而，在「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身不由己的仕宦生涯中，東坡並不能長保這樣的處境和心境。而東坡對「絕緣之孤獨」的耐受力，也很可能不及淵明。大半生他身邊總有手足、妻妾、兒子、弟子、可以論文辯難的友人、敵人環繞，即使遠謫瓊州，也有蘇過（三子）隨侍。東坡的兒子當然遠比淵明的兒子更能認知父親的傑出、也更能滿足父親的期許。^{④⑥}至於淵明，無論在家人或友人方面都比東坡更乏知己，不過，這也許正是淵明能寫出具有原

④⑤ 引自哈洛·卜倫（Harold Bloom）《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高志仁譯，頁41。

④⑥ 蘇軾三子過，宋史有傳，附於東坡傳後，有《斜川集》二十卷行於世，時人稱之為「小坡」。長年隨侍東坡左右，以孝名於宗族。淵明之子則未能稱是。

創風格田園詩作的原因，他在大自然中深刻感受力與美，也在與自然相親相近中，才能撫慰身心俱寂的強烈孤獨。

東坡對淵明，認同中其實仍有很大不同。然則，在幾乎毫無保留的稱許推重之餘，東坡對淵明是否絕無微辭？似乎仍有可以再加深究之處。

（ 3 ） 影響的焦慮——東坡對淵明的質疑

當代美國文學批評家哈洛·卜倫（ Harold Bloom ）曾提出一種批評觀點，他稱之為「影響的焦慮」（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認為「如果沒有文學影響，此一惱人且難於理解的過程，有實力的正典作品便無由產生。……實力雄厚的作品，本身就是那份焦慮。」^{④7}作品的生成，「總免不了會受到先前作品的推磨擠壓」，「英雄惜英雄，英雄也是英雄的陰影。」「成為偉大作家的欲望，就是在自己的時空裏，在原創、傳承和影響焦慮必得相濡以沫的情形下，動身前往他方的欲望。」^{④8}然則，對東坡而言，在以之為異代知己、推重備至的同時，淵明是否也會形成東坡的「陰影」？東坡的詩文究竟有沒有受到淵明的「推磨擠壓」？值得再加探索。

東坡「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直言「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④9}認同感十分強烈。這段話寫於紹聖二年（ 1095 ），當時情境是「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既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⑤0}可知東坡是在小睡初醒、身心俱適的情況下出此言。但從其他在不同情境中和陶詩的作品，可以看出東坡似乎仍不免有意與淵明一較高下。

如和「桃花源詩並引」中，東坡指出，淵明所記桃源並非仙境，「漁人所

④7 同註 45，頁 12。卜倫另有《影響的焦慮》（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73 ）可參閱。

④8 同上，引文見頁 15 及頁 17 - 18。

④9 同註 2，頁 32 - 33。

⑤0 同上。

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⑤①}切中肯綮，觀點十分犀利。又另舉出「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的小有洞天——仇池」，以之為另一桃源。^{⑤②}在和詩中更明言：桃源「不如我仇池」，仇池之美「桃花滿庭下，流水在戶外，卻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⑤③}認為桃源之人乃避秦時亂而隱，既然「有畏」，當然非能真契於道者。詩作與序文都明顯流露與淵明較勁之意。卜倫認為「作者面對其他作者和作品，進行暗中和明白的爭逐，堂堂展現出競技與勝利的力量。」^{⑤④}「每一個雄心勃勃的作家，主要還是為自己出頭，不管是趣味橫生，或咄咄逼人，競賽的意味總是存在著。」^{⑤④}東坡無疑應為中國傑出詩人中相當好鬥的「氣魄人」，這種競技、好勝之心，即使面對最心儀的淵明，仍難以盡掩。或者正因為對淵明的折服而更有「影響的焦慮」，不能不存競勝之念。

例如收入「東坡續集卷一」的一首五古「問淵明」，完全針對淵明的「形影神三首」提出質疑：

「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則為星斗懸，我散而卑之，寧非山與川？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非永年。皇皇謀一醉，發此露槿妍，有酒不辭醉，無酒斯飲泉。立善求我譽，飢人食饞涎，委運憂傷生，憂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為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事此言？」^{⑤⑤}

行文中處處可見與淵明詩的針鋒相對，尤其是淵明「神釋」的結語「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更成為東坡質疑的重點。但無論如何，淵明原作仍具原創性，東坡只是逞其才

⑤① 同上，頁 36。

⑤② 同上。

⑤③ 同上，頁 36 - 37。

⑤④ 同上，頁 36 及 38。

⑤⑤ 「蘇東坡全集」續集第一卷。頁 28。

智，不肯服輸而已。

持平而論，東坡和淵明詩一百零九篇，多半不及淵明原作，如淵明「飲酒」二十首，幾乎每首皆為傳誦至今的傑作，而細品東坡和作，則不免用典嫌多、真情惜少，幾乎不曾被選為蘇軾的代表作。但如以全部作品而論，則蘇軾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當然是重量級的，絕不遜於陶潛，其文章、詩、詞都開一代風氣之先，足以列入卜倫所稱「正典」之列而無愧。也許正因為有淵明這樣的「典型」在前，更促成東坡不斷的自我超越，「寫作與閱讀是為自我與未曾謀面的人。」^{⑤⑥}東坡以淵明為知己，是否也以之為不同時空的對手？在和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的首篇，東坡希望畫葛洪、淵明和他自己三人為「三士圖」，但結語卻說「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⑤⑦}可見東坡對一己詩才之自負。

因此，東坡之推重淵明應該仍是以其人為主，再及其詩。東坡對淵明稱許備至，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淵明做出了超乎損益利害計算、甚至不顧基本溫飽安全的抉擇，只為了保全精神的自主、自由與自我的尊嚴，這是以才、氣自許的東坡自慚徘徊半生卻始終未能付諸實踐的行動。至於稱賞淵明的作品，與宋代詩壇風氣的變革，不能說沒有關聯。宋詩不尚華靡，重質樸、理致，與陶詩風格正遙相承應，東坡以獨到之識見，洞察其源，確立了淵明在文學史上不移的地位。但東坡的詩、文，自有其一己之風格、成就，並未受淵明籠罩、囿限。

在文學創作上，「美學價值源自記憶，也源自痛楚——放棄較便捷的快感，執意追求遠較艱辛的快感。」「成功的文學作品是焦慮的完成，而非焦慮的舒解。」^{⑤⑧}從歷史進程來看，仿作總不及原創，而走一條前人已走過的熟路，不免被歸於「便捷」一類，東坡如果在個人創作方面也一味「學陶」、

⑤⑥ 同註 45，頁 51。

⑤⑦ 同註 11，頁 82。

⑤⑧ 同註 45，頁 53。

「效陶」，意欲「師範其萬一」，決不可能在文學史上有自己堅實的地位，高明如東坡豈會不知？他晚年對自己身後不朽之名能有「身經萬里頭初白，名已千秋心自清」的自信，也許多少肇因於對淵明「影響的焦慮」，以及在創作上「焦慮的完成」。

結 語

蘇東坡對陶淵明的認知，雖不同於他人，卻未必一定就是淵明真實的自我。這篇短文只是試圖探索東坡所以會如此傾倒於淵明的深層因素。淵明出於自由意志的考量，做出超越現實利害的抉擇，更能不計世俗他人的毀譽，在寂寞「荒途」上，堅持獨行，這是讓東坡折服的重要原因。而淵明與自然相親相近，視己身為自然的一部份，毫無間然的融入其中，不干擾、不支配，沒有現世權力階級制度宰制的「桃源」是淵明心靈的故鄉。這種齊觀生死、與自然契合的認知與實踐，也是東坡在「赤壁賦」中以如此精采的文章心領神會之處。

但東坡與淵明畢竟在生存時代與自我個性上都有很大差異，東坡不能作淵明那樣的抉擇，但淵明的人格、精神與作品，全都成為東坡自覺或不自覺的「競爭」對象，東坡在文學史上的輝煌業績，應該多少與這種「焦慮」的超克有關。

東坡對淵明的卓見，抹倒眾議陳辭，讓後人在「田園詩人」、「隱逸詩人之宗」、「避俗翁」、「帶性負氣之隱者」等等印象之外，能夠從完全不同的視角認知淵明人格的深度，抉擇與承擔的大勇，同時也在文學史上為淵明「推磨擠壓」出一個確定的位置，當然更因此讓我們得以窺見東坡自己內在掙扎與超越的歷程。

參考書目

- 陶淵明詩箋證稿 王叔岷撰 (藝文民64年1月初版)
- 蘇東坡全集 (河洛民64年9月初版)
- 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詩文彙評 (明倫民59年12月初版)
- 文心雕龍注 劉勰撰 (開明民52年3月台三版)
- 鍾嶸詩品箋證稿 王叔岷撰 (中研院文哲所民81年3月初版)
- 談藝錄 錢鍾書著 (書林民77年11月)
- 詞選 鄭騫編注 (文化大學出版部 民84年6月新一版第5刷)
-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 法蘭西斯·福山著 (Francis Fukuyama)
李永熾譯 (時報 1993年4月初版)
- 國家的神話 恩斯特·卡西爾著 (Ernst Cassirer) 范進等譯 (桂冠 1992
年1月初版)
- 世紀末的思想與社會 李永熾著 (久大 1993年4月初版)
- 西方正典 哈洛·卜倫著 (Harold Bloom) 高志仁譯 (立緒民87年1月
初版)